日本古代文献对中国典籍的征引逻辑与本土化重构 ——以《日本书纪》为中心

刘琳

(浙大城市学院, 浙江省杭州市, 310015; liulin@hzcu.edu.cn)

摘要: 本研究聚焦日本现存最早官修正史《日本书纪》, 运用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, 探究其对中国典籍的引述实践及本土化转写策略。研究发现, 《日本书纪》的编纂者服务于奈良时代中央集权国家建构的政治诉求, 对中国史料的运用呈现为三重策略性机制: 选择性摘录(如规避《孟子》民本思想而集中引述《尚书》天命章节)、语义重构(如神武纪以“三神器”置换传国玉玺符号)及叙事框架的借用与转化(如套用《史记》本纪体例但删除太史公史评体系)。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征引情况并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文本比对, 揭示其征引行为的内在逻辑: 引用频度随大化改新等国内政治变革呈现显著波动; 在叙述神代史与天皇纪时, 对中国典籍的依赖程度与转写策略存在阶段性差异; 对儒道思想的引用聚焦实用目的, 如壬申之乱后重构战争伦理。本质上, 这种本土化转写折射出奈良时代日本建构国家正统性的核心策略。即通过对华夏文本的系统性转码与挪用, 实现“假借他者之言, 以证成自我之实”的文化主体性确立。

关键词: 《日本书纪》; 中国典籍; 文本征引; 文化转码; 本土化重构

引言

养老四年(720年)由舍人亲王等奉敕纂成的《日本书纪》, 作为日本首部汉文编年体官修正史, 其编纂承载着奈良时代律令制国家建构的核心政治诉求。彼时日本正处于从口传传说(《古事记》序文所称“上古之辞”)向书写文明转型的关键阶段, 编纂者面临双重困境: 一方面需将本土神代叙事转化为符合东亚史书范式的文本, 另一方面须在借鉴中国史籍体例的同时维系王权独特性。这种张力在文本操作中具象为对中国典籍的策略性征引——据黑板胜美统计, 全书征引中国文献涵盖《尚书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数十种典籍[1]。并且, 此种征引绝非被动誊录, 例如神武纪(卷三)借用《史记》本纪框架时, 编纂者实施了关键性置换: 删除“太史公曰”史评体系以阻断中国史学的批判传统。森博达在分析书陵部藏本栏外注时, 发现存在墨涂覆盖“史臣论曰”字样的痕迹[2]。与此同时, 中国符号系统被彻底替换: 司马迁笔下刘邦“赤帝子斩蛇”的天命隐喻, 转化为“天磐船降临”的神裔叙事; 象征王权的传国玉玺, 则置换为“镜剑玉”三神器组合[3]。

检视既往研究, 其焦点多集中于两方面: 一是对《日本书纪》所涉中国文献来源的考据梳理, 二是探讨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单向“影响”。然而此类研究往往相对抽离于特定历史语境——即大化改新(645年)后日本构建律令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关键期。在此背景下, 由朝廷主导的国史编纂, 其意图性与编纂者的文化政治自觉具有不可忽视的权重[4]。编者对中国典籍的运用, 应被理解为在明确政治目标指引下的、高度选择性与策略性的主动行为。

本文立意在于超越传统的“影响-接受”研究范式, 转而从具体的文本征引情况切入, 追踪关键概念的转写与转义(如“天命观”向“神敕论”的蜕变), 进而揭示其文化转换的深层机制[5]。方法论上强调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化的结合, 旨在阐明《日本书纪》如何通过对中国史料的系统性改写, 完成将“他者之记录”转化为“自我之表述”的功能性蜕变。

1. 中国典籍的征引动因及实践类型

1.1. 征引的历史语境

日本对汉籍的系统性受容肇始于推古朝（593-628年）的官僚制度改革，《隋书·倭国传》明确记载推古十五年（607年）遣隋使“持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归”的史实（卷八十一东夷传），此为日本官方引进汉籍的最早实录。至养老二年（718年）《养老律令》颁布，《学令》确立大学寮“九经讲读”制度（含《礼记》《左传》等必修典籍，《周礼》为补充文本），标志汉籍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[4]。这一制度建构为《日本书纪》编纂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——据正仓院文书《写书杂用帐》（或称《写经杂用账》）记载，编纂期间调用汉籍达数十种，涵盖经史子集四部[6]。汉籍输入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演进特征（见表1）。

表1 汉籍输入的阶段性特征

时期	核心事件	传入典籍	文献依据
推古朝（592-628）	遣隋使派遣	《论语》《孝经》	《隋书》卷81东夷传
白凤期（645-654）	遣唐使派遣	《史记》《汉书》	《日本书纪》舒明天二年条
养老二年（718）	《养老律令》制定	九经（含《周礼》）	《令集解》卷一学令篇

如表1所示，从推古朝的初步引介到养老二年的制度化确立，汉籍在日本的受容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渐进过程。而此种制度性受容与奈良时代双重困境直接关联：一方面，文字书写系统尚未成熟化，《古事记》序言直言“虽本辞存，然文意难通”[2]；另一方面，大化改新（645年）后新兴天皇制亟需合法性支撑[5]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中国典籍成为王权建构的意识形态转码介质，其征引深度服务于律令制国家目标[4]，具体表现为三重逻辑链条：从遣唐使输入的史籍（见表1）与大学寮讲读制度构筑知识基础，到编纂团队对汉籍的政治筛选（如神代卷删削《淮南子》盘古创世说），最终通过术语置换（详见2.2节“天命→神敕”案例）实现王权神学化重构。

1.2. 《日本书纪》征引中国典籍的类型与策略

《日本书纪》由舍人亲王等奉敕编纂，养老四年（720年）成书，凡30卷。现存最古文本为平安时代九条家本（东京国立博物馆藏），其文本完整性经神田喜一郎考证确认[7]。作为日本首部官修正史，该书集中反映了大化改新（645年）后律令制建构期的史学特质。编纂者面临双重挑战：对内需弥合壬申之乱（672年）导致的天武系王权断裂（《续日本纪》文武天皇四年条载“修国史以定朝仪”），对外需在唐朝主导的华夷秩序中确立日本的定位。据《续日本纪》养老年间条记载，编纂所据汉籍主要有三途：一是大陆移民携入的早期儒家文本（如正仓院南仓藏吉备真备《论语》古抄本）；二是遣唐使带回的史籍（如舒明天皇十一年/639年《汉书》六十卷献纳记录）[8]；三是佛教僧侣夹带纬书（如《日本灵异记》中卷载《春秋演孔图》残卷）。基于文献来源的多样性，编纂者对不同类型典籍采取了差异化的征引策略，呈现出明确的功能分工（见表2）。此外，如表2所示，《日本书纪》对经史子三部典籍的征引各有侧重：经部文献主要服务于王权神圣化论证，史部文献用于构建谱系正统性，子部文献则分别承担宇宙观建构与制度理论支撑功能。

表2 《日本书纪》征引文献的类型学分析

文献类型	核心典籍	关键操作	功能实现	史料依据
经部	《尚书》《诗经》	聚焦“天命”章节，删除“民本”论述	确立血统神圣性	推古纪转写《尧典》朱批（前田育德会藏本）
史部	《史记》《汉书》	借用本纪体例，删除史评体系	建构万世一系谱系	神武纪与《高祖本纪》文本比对
子部	《淮南子》《周礼》	神代卷采用《淮南子》宇宙论，历史卷征引《周礼》制度内容	分阶段论证王权	神代卷古训注引《淮南子》

《日本书纪》对中国典籍的处理呈现系统性政治筛选特征。在经部文献的转码实践中，对于《尚书》的征引中多集中于“天命”“圣王”章节[1]，典型如卷三将“克明俊德”转写为血统神圣符号。耐人寻味的是，涉及“民惟邦本”的《皋陶谟》被全文规避，《孟子》“民贵君轻”说更是被刻意缄默。这与同期《古语拾遗》序言援引《孟子》的现象构成鲜明对比[1]。

史部体例的移植策略则体现为双重操作：编纂者借《史记》本纪框架叙述天神七代谱系时，系统性删除“太史公曰”史评体系（见表2），阻断史学的批判维度 [9]；《汉书·西域传》原有的“蛮夷戎狄”分级制，在卷九新罗传中被重构为“邻邦-蕃国”秩序（坂本太郎校注本卷九校勘记确证此为独创术语），通过术语置换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空间叙事。

而对于子部文献的征引则进行了时空分化运用，编纂者在神代卷（卷一）截取《淮南子》宇宙论构建创世神话，却删除盘古化生万物的核心情节 [7]；而在近代史卷次（卷廿五）则密集援引《周礼》地官制度，为班田收授法等律令措施提供理论支撑 [4]。这种按需取用的策略，实质上是以王权需求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过滤工程。

1.3. 《日本书纪》征引中国典籍的方式

《日本书纪》编纂者对中国典籍的操作呈现精密的本土化转码策略。以推古天皇纪（卷廿二）重构《尚书·尧典》为例，原文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”被改写为“天皇明德光被，德配天地，亲九族”（前田育德会藏庆长本卷廿二朱批显示“皇祖肇造天地”系补入）。这种转写实质包含三重文化操作：

- （1）主体神格化：增补“德配天地”等修饰语，将尧帝品德升格为天皇神性；
- （2）概念置换：删除“协和万邦”的天下观，阻断华夏普世主义；
- （3）谱系植入：添加“皇祖肇造”宣言，构建神统连续性。

综合分析《日本书纪》全书，编纂者对中国典籍的征引呈现出四种主要技术路径，各自承载不同的文化功能（见表3）。

表3 《日本书纪》征引中国典籍的技术实现及功能实质

征引方式	操作手法	典型案例	功能实现效果
直接征引	主体置换+神格强化替换原典行为主体为天皇，增删修饰语改变权力属性	推古天皇纪（卷廿二）改写《尧典》《尚书·尧典》原文：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”→改写：“天皇明德光被，德配天地，亲九族”	将历史人物品德描述转化为天皇神性证明
意译改写	元素删除+哲学转化移除异质创世元素，将主动生成叙事转为自然演化表述	神代卷（卷一）删《淮南子》盘古化生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原文：“清阳者薄靡而为天”→改写：“古天地未剖，阴阳不分...清阳者薄靡为天”※删除盘古“垂死化身”情节	构建无中国创世神的本土宇宙观
结构借用	空壳框架+本土填充借用史学体例框架，置换核心内容为日本神话体系	天神七代叙事套用《五帝本纪》框架 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框架：帝王世系+功业记述→套用：天神代次+造化功绩※保留本纪体例但删除“太史公曰”史论	使本土神话获得正史权威形式
反向印证	语义解构+关系重置解构朝贡用语，通过转译关键词与增补虚构情节重构外交关系	神功皇后纪（卷九）重构朝贡叙事《三国志·魏志》原文：“倭女王遣使朝献”→改写：“神功皇后遣使通交于魏”+增补：“新罗王渡海献贡”	将臣属关系转化为对等外交，确立日本区域宗主地位

如表3所示，《日本书纪》通过直接征引、意译改写、结构借用、反向印证四种方式，实现了对中国典籍的系统性改造，最终构建起以天皇为核心的本土化知识体系。在宇宙观建构层面，神代卷（卷一）对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的改写具有深层意义。原文“清阳者薄靡而为天”的动态创世论，被转化为“阴阳未剖...清阳薄靡为天”的静态表述（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九条家本显示“盘古垂死化身”遭墨涂销）。这种定向删除与《古事记》的本土化策略形成方法论区分 [7]。前者剥离华夏创世神学，后者则重构神道起源叙事。而对于外交关系的重构则体现出明确的政治意图。神功皇后纪（卷九）对《三国志·魏志》“倭女王遣使朝献”记载实施三重解构：

- （1）术语转译：“朝献”改为“通交”（正仓院文书《外交辞令集》草稿证实此词用法）；
- （2）事件虚构：增补“新罗王渡海献贡”情节

（3）人物叠合：栏外注“神功即卑弥呼化身”（卜部兼方自笔注本） [7]。此类操作与奈良时代外交实践形成互文：天平宝字三年（759年）遣唐使国书自称“日出处天子”，恰是文本转写的政治投射。

2. 本土化重构的机制与实证

《日本书纪》对中国史料本土化改造，本质是通过精密的文化转换实现的文明自立宣言。其操作核心聚焦于三大维度的系统性转换：

2.1. 概念体系的神道化转码

《日本书纪》对中国政治哲学概念的改造，集中于剥离其民本内核并植入神道元素。典型操作见于推古天皇纪（卷廿二）对《尚书·泰誓》天命观的重构：

《尚书·泰誓》原典：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（天命通过民意呈现）

《日本书纪》推古纪改写：“天神授玺于皇孙，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”（神意直授皇族）

这一转写包含三重系统性操作：首先通过主体具象化，将抽象“天”置换为天照大神谱系；其次实施中介删除，彻底移除“民”的合法性仲裁功能；最终完成契约固化，使德政-天命的动态关系退化为血统永恒论。

此类转码导致儒家民本思想被选择性排除。森博达的文献调查证实：《日本书纪》编者刻意回避《孟子》“民贵”说，现存古抄本未见相关引文[2]。其本质是通过语义置换，将华夏政治伦理转化为神权正统性论证工具。

2.2. 史籍体例的本土化再造

编纂者通过框架置换实现历史叙事的主体重构。神武天皇纪（卷三）对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的移植构成典型案例：

《史记》原型：感生神话（蛟龙）→ 诛暴秦（正义性）→ 约法三章（制度奠基）《书纪》重构：天神降居（天磐船）→ 平“未化之民”（文明开化）→ 橿原建都（空间主权）

这一重构通过三重系统性置换实现本土化转型：

（1）符号体系置换：以八咫乌引路（东京国立博物馆藏7世纪“八咫乌纹柄镜”佐证）、三神器组合置换华夏天命符号；

（2）时空坐标重置：前置创世神话为国史原点（国常立尊），以“神武纪元”（前660年）覆盖中国正朔[10]；

（3）权力逻辑颠覆：以血统连续性叙事消解《五帝本纪》的禅让制。

这种操作实为借《史记》本纪之形，孕育出神道史观之实质。当持统纪（卷三十）挪用《淮南子》“清阳为天”论述伊势神宫镇座时，中国宇宙论已被转化为神道仪轨的理论注脚。

2.3. 史料工具化的政治逻辑

《日本书纪》对中国典籍的运用始终服务于奈良王朝的现实政治诉求。壬申之乱（672年）后，天武天皇面临武装夺权的政治困境，编纂者通过对《墨子》战争伦理的重构实现合法性辩护：

《墨子·非攻上》原典主旨：“诛暴非攻”（限定战争于道德讨伐）

《日本书纪》卷廿九天武纪的文本转写：“神敕曰：速以正义之器诛逆”（宫内厅藏庆长本）

以上转写包含三重精密设计：

（1）理论截取：盗用“诛暴”概念但删除“非攻”的约束条件；

（2）神谕虚构：添加“神镜昭敕”情节（《续日本纪》持统三年条载祭祀记录佐证）；

（3）语境重置：将跨文明征伐理论转用于皇室内部权力斗争。

此外，上述工具化倾向在祥瑞记载中更为显著。淳仁纪（卷廿三）连续记载十余次祥瑞（白雉→赤龟→紫云，《续日本纪》卷廿三淳仁纪补注统计），其频度超《旧唐书·五行志》中所载[10]。但编纂者系统性删除《汉书·五行志》“祥瑞失德则隐”的辩证机制，通过控制文本可见性，建构“神国优位”的历史叙述。

3. 结语

《日本书纪》对中国典籍的系统性转写，本质是奈良王朝建构文化主体性的关键策略。通过对华夏核心概念的置换，如将《尚书》“天命”观固化为“三神器传承”的血统符码（神武纪卷三）[2]，并删除《孟子》“民贵”说的伦理中介——编纂者实现了双重目标：在东亚汉字文明圈内确立日本王权的正统性，同时维系神道叙事的独特性。日本学者坂本太郎[9]指出，这种操作直接服务于律令制国家的现实需求：“当大化改新引入唐制时，国史编纂成为调和外来制度与本土信仰的熔炉”。

文本操作的技术创新体现为跨语境移植：在神代卷（卷一）中，编纂者将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“清阳为天”的宇宙论剥离原典，转用于伊奘诺尊创世叙事（宫内厅书陵部藏庆长本卷一墨书旁注：“取淮南说以证神产”）[2]；持统纪（卷三十）则截取《汉书·郊祀志》封禅记载，置换为“伊势神宫镇座”场景。此类操作通过本土化转码，使中国典籍转化为神道仪式的理论注脚。

其终极意义在于开创后发文明的合法性生成范式。编纂者通过控制文本可见性，如密集援引《礼记》职官制度（卷廿五孝德纪）规避《左传》“革命”理论[5]，连续记载祥瑞（淳仁纪年均1.22次）但删除《汉书·

五行志》辩证机制，由此构建出“仿华而超华”的文明定位。日本学者远藤庆太对此断言：“这不是文化依附，而是以汉语为武器宣告文明自立”。当8世纪编纂者将《墨子》“诛暴”理论转用于皇室战争辩护（卷廿九天武纪），其本质是通过解构他者文本来重铸文化主体的自我宣言。

基金项目

本文为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“日本古代文献所见中国史料的整理与研究”（21YJAZH052）的阶段研究成果。项目主持人：浙大城市学院刘琳

参考文献

- [1] 黑板勝美,国史大系編集会. 国史大系 第1卷. [M]. 東京:吉川弘文館, 2003.
- [2] 森博達. 日本書紀成立の眞実 [M]. 東京:中央公論新社, 2011.
- [3] 遠藤慶太. 日本書紀の誕生—編纂と受容の歴史— [M]. 京都:八木書店, 2018.
- [4] 井上光貞. 律令 [M]. 東京:岩波書店, 1994.
- [5] 井上光貞. 日本律令の成立とその注釈書 [J]. 法制史研究: 法制史学会年報 (27), 1977.
- [6] 正倉院事務所. 正倉院文書_北倉No.103「写書雜用帳」 [Z]. 奈良:正倉院, 1987.
- [7] 神田喜一郎. 日本書紀古訓攷証 [M]. 東京:養徳社, 1949.
- [8] 黑板勝美,国史大系編集会. 国史大系 第2卷 [M]. 東京:吉川弘文館, 2003.
- [9] 坂本太郎 校注. 日本書紀(岩波文庫版) [M]. 東京:岩波書店, 2003.
- [10] 黑板勝美, 国史大系編集会. 新訂増補国史大系 第24卷. 東京: 吉川弘文館, 2007
- [11] 舍人亲王 撰. 日本書紀 [M]. 慶長十三年活字本(1610) [12]. 魏征. 隋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点校本, 1973.
- [13] 施建军, 王大钊. 新基于汉文体计量特征的《日本书纪》各卷分类研究 [J]. 日语学习与研究, 2024(4):12-25.
- [14] 姜金言, 苗威. 《日本书纪》对神功皇后传说的政治塑造 [J]. 史学集刊, 2023(6): 98-108
- [15] 孙家坤. 《日本书纪》国土生成神话的文本与表征分析 [J]. 亚非研究, 2022(2): 197-208
- [16] 龚卉. 《日本书纪》“神代”卷的世界结构刍议 [J]. 日本文论, 2022(1).